

辑的编纂与出版,为历代科举制度史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这套《丛刊》还将继续编纂下去,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文献整理事业。在本次会议上,以上两个大项目主持人都作了汇报,有助于科举学界沟通信息。同时,也反映了我国科举研究的新成就。

总之,新观点、新思维、新材料、新成果,正在提高科举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平。本届学术研讨会充分显示了跨学科研究优势与威力。

这一届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不同于以往,如果说以往的研讨会是民间自发组织的,那么现在是有了一个学术组织——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专业委员会,来联络、协商、率领这一场学术研究的“总攻”。可以期待:今后,我们这一支学术实力雄厚、跨学科的、老中青相结合的、探索前景十分广阔的学术队伍,将会以更勃勃的生气、更充满生命活力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的东方,取得更加丰硕的业绩。

(浙江大学古籍所 龚延明)

第五届淮河文化研讨会综述

2009年11月7日至8日,第五届淮河文化研讨会在安徽淮南市隆重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河南、山东、安徽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74篇。与会学者围绕淮河流域历史、地理与考古,淮河文化的概念与内涵,民俗艺术,历史时期淮河流域的社会发展,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淮南子》与道家,历史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现将会议内容概述如下。

一、淮河流域历史地理与考古方面的研究。本次会上这方面仍然是讨论的重点。考古方面提交的论文近10篇,历史地理方面有20多篇。由于近年来淮河流域的考古有较多的发现,考古学者已提出了“淮系文明(化)”的概念,并且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本次会议上朱光耀、阚绪杭等人根据淮河中游新石器遗址出土资料讨论了该时期的人地关系。徐大立副研究员通过对双墩遗址出土的红烧土遗迹和部分刻划符号的辨析,认为当时除了干栏式建筑外,还存在两面坡形的地面房屋建筑,表明在7000年前,双墩先民不仅能够依据气候环境和地形地貌来确定居住形式,而且其间已经蕴含着氏族部落内部存在的原始崇拜、宗教信仰、组织分工、等级差别和经济形态对建筑形式的不同需求。另外几位学者就新近发现的蚌埠双墩遗址春秋墓葬形制、土偶现象与蚌埠双墩新石器遗址中的蚌器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部分学者还就怀远禹会村遗址、固镇壕城遗址、六安楚墓等的最新发掘情况做了介绍,引起与会学者的兴趣与热烈讨论。

历史地理方面,陈立柱代表课题组就古代淮河的多种称谓与定名问题作了发言。他认为,古人称谓淮水为“江”,有时又曰“江淮”,一如称名汉水、湘水为江汉、江湘一样,江者南方民族大水之谓也。可以看出,淮河流域古代是华夏、东夷与江汉三大族团争夺与汇聚之地,名称的变化充分体现这一点。因此,淮水之名称音读的变化,体现的是这一地区古代民族迁徙盛衰的历史变化与文化上的融通汇合。王大庆针对《明史·河渠志·黄河》有关古代运河的记载,参

照大量的地方志、治河专书与文集资料等,考察了碭、萧及周边河湖、河工和聚落名称的变迁,与河道迁徙、淤废及汴、泗、睢水系之流变联系,明人对“淮南、淮北”地理概念的认识,以求证这一黄河冲积辐射区内引水济运、贾鲁河治理、保漕护陵的地名沿革、差异及人地关系。孙天胜讨论了古泗水的变迁及其对流域经济的影响,陈隆文副教授讨论了汝、颍二水的古代变迁,指出要用变化的动态的观点看待古代水系的变化与对当地的影响,曾承与吴海涛通过量化方法的运用对历史文献中记录的淮河流域气候变迁进行了分析研究。此外,关于淝水之战的具体地点、上古帝王舜的籍贯、颍上杨湖镇方言的地域特点、明初凤阳府的移民文学、皖北地区政治文化的生态问题,等等,都有学者进行探讨。

二、淮河文化的内涵与特征研究。这是每一次讨论会都会涉及的老问题,本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并不多,但讨论十分热烈。程必定在主题发言中提出淮河文化之魂是水,犹如山是徽州文化之本,山水交融是皖江文化的突出特点一样,要特别注意水之利害在淮河文化中的影响,淮河流域的落后,水灾、旱灾是重要的因素。一些学者指出要更多地注意淮北地区,因为其面积占淮河流域的绝大部分,淮北地区历史文化的特点在淮河文化中更具代表性。另一些专家提出要尽快提炼出淮河文化的主要特点与积极方面,以便政府方面加以利用,否则淮河文化的研究很难得到政府的支持。还有学人指出,淮河流域因为近千年来的落后局面,值得发扬的高尚文化并不是很多,反而落后的东西特别突出,这是需要注意的。也有的学者指出文化研究除了发扬优秀的传统外,提出问题也是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学者们将问题提出来,政府方面才能根据情况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更多的人认为任何文化的内涵都是极其复杂的,文化定义本身也是十分多样的,淮河文化的内涵存在着多样性的理解很正常,随着研究的深入,才有可能趋向一致或大体接近。张文华与胡阿祥通过对南北朝时期淮河作为南北军事、政治分界线,与华夏和戎狄交相攘夺的最前线这一事实的分析,道出了千里长淮所具有的文化意蕴,既是中原文化的呵护之神、华夏正统的维系之线,又往往流淌着民族之恨、充满了亡国之痛,表现于无数诗人骚客的感怀之中。

三、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的研究。这方面过去已经取得了较多的成果。本次会议上,周怀宇教授根据历史上淝水与施水相通连的情况,提出巢湖是沟通江淮的重要枢纽,建议引江济巢、开通巢淮、构建江淮巢新体系,以改善江淮中部的生态环境。张金铄通过对元代淮河流域商业发展的研究认为,元朝建立后,南北往来禁令不复存在,农业和手工业得到恢复,加大大运河的凿通,交通更加便利,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陆发春通过对明清时期安徽江淮地区社会经济开发的综合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江淮地区社会经济开发可以概括为人口迁移和劳动力输入、田地开垦的恢复与增加、灾害与治理并行的经济环境、粮食与经济作物的种植、市镇的崛起等多方面。朱正业通过对民国时期皖西茶叶改良的探讨,分析了皖西茶业衰落的原因,并提出了皖西茶业改良的建议和措施。张晓丽以1954年淮河水灾为例,阐述了20世纪50年代淮河水灾中的疾病状况与医疗救助,分析了建国初期政府救灾的机制特点等。程必定利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了“合(肥)淮(南)同城化”的趋势及文化意义。李德楠通过对明代漕船“过淮”的时限规定及原因的探析,认为过淮时限作为河道管理的重要举措,反映了河道特点和管理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漕运的畅通,但终归是治标之策。袁飞通过对清代漕河运道的研究,勾勒了清代漕粮运输路线图。马彩霞等就元代河南江北行省农业发展的因素问题进行了研究。

四、淮河流域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吴海涛分析了元明清历史上的政府决策,指出政府的各种决策都以维护京杭运河漕运安全的需要为主,淮河中下游地区因而成为保运、护陵的牺牲品,从而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卢勇与王思明根据明清时期淮河南下的过程,分析了黄淮合流、淮河改道引发的系列环境巨变。周运中通过对明清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的研究,利用地方志资料,从民间信仰、学术发展、宗教组织、社会阶层等方面论述了明清皖北文化在灾荒影响下的变迁,指出其学风不振、学校不兴是其学术文化落后的主因。张崇旺等通过对皖北地区文化现状的调查研究,探讨了皖北地区文化建设事业落后的原因。张岩丽、刘英对淮河流域名人旅游资源开发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淮河流域历史悠久,各类名人代不乏人,应当充分挖掘各类名人文化资源,制定合理的开发方略,以达到利用名人资源谋求区域发展的目的。朱家席从道家自然观的视角,论述了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他人的研究中也多有涉及淮河流域落后问题的讨论。

五、民俗艺术的研究。这一方面参与的人一直很多。郭学东通过对淮河流域几十年来传统节庆剧烈变化的整体考察,提出用开放的心态构建传统节庆文化,让传统节庆保持历久不衰的生命活力。陈德琥通过与潘丽商榷的形式,重新探讨了花鼓灯艺术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及其产生发展于淮河流域的文化土壤与必然性。马晓、洪光针对花鼓灯艺术研究与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传承花鼓灯的活态文化基因及保持广场艺术的表演形式对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周朝生、陈敬芝、李庆南等人考察了推剧的萌芽、形成各阶段的历史,分析了推剧的艺术特色,并通过现场表演体现的艺术魅力,呼吁当局与社会对这一珍稀地方剧种加以研究、重视、保护和发展,从而达到文化遗产的目的。赵冰探讨了“界首彩陶烧制技艺”的历史渊源与艺术价值,提出今后加以保护的多项措施。王申红通过对皖北地区回族女性宗教信仰现状的调查,探讨了皖北地区回族女性宗教信仰的特点以及宗教信仰对民俗文化的影响。胡飞通过对蚌埠涂山禹王庙会泥娃娃的造型结构、色彩线条的研究,指出其具有南北文化艺术融合的特点。此外,孙祥宽讨论了凤阳锣鼓乐的起源问题,郑虹霞讨论了三曹(曹操父子)乐府诗在语言风格、构思章法与体裁形式等许多方面表现的不同取向,谢政伟以蚌埠地区为例探讨了淮河流域开发利用民俗文化资源的基本对策,门莹分析了淮河流域诉讼文化的特点,冯传礼介绍了其在沿淮地区考察搜集的民风异俗。

六、关于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郭从杰通过对民国时期倪嗣冲督皖期间所施政策措施的研究与分析,一改过去学术界所持的倪嗣冲“祸皖”的看法,认为倪嗣冲主政安徽期间,保境安民,为民初安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较为安定的政治环境。李强也以倪嗣冲为中心考察了民国初年皖北地区的赈灾问题,认为倪氏重视灾荒救济,兴修水利。刘学慧通过对李鸿章的系统研究,认为李鸿章的所作所为,除了受当时社会环境、个人理想与追求的影响外,还受到几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的影响。李孔文通过对孙家鼐教育实践活动的研究,认为他筹办京师大学堂,影响我国新学制的设立,对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与教育转型贡献很大。李晓秋讨论了曹操家族的世系渊源、六位君主、曹操妻妾子女及其家族的历史影响等。孙亚军认为,魏晋嵇氏家族以义为先的儒学家风与博雅好学的家学传统,与受淮河文化的浸润密切相关。朱寅通过对后周与南唐寿州之战的缘起、进程及双方胜负原因的分析,考察了本次战役对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的影响。李艳洁对近20年来大禹神话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统计学的研究,提

出了今后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七、《淮南子》与道家的研究。王硕民系统讨论了《淮南子》的兵学思想。张良宝从音乐情感的产生、音乐情感的表现与接受以及审美等方面讨论了《淮南子》的情感论音乐美学思想。张邦建分析了庄子的道性自然、人与自然和谐以及有生于无的创生观。董小改从结构、表现手法和语言方面探讨了《淮南子》的艺术成就。王启敏通过刘安对屈原评价的两重性特点及其在汉朝的影响的研究,说明其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李耀细致分析了《淮南子·齐俗训》的主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孙友虎讨论了“淮南王现象”在明代政治及淮南地区的影响,指出明代废除“淮南”行政区划与明专制主义政治等,都与明皇帝对于“淮南王现象”的认识有关。

和以往相比,本届淮河文化研讨会显示学者视野更加开阔,淮河流域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领域的问题大都有所涉及,赴会的专家学者既有来自淮河流域各省的,也有其他地区的,尤其是一批博士、硕士生的参与让人看到淮河文化研究大有希望。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陈立柱、安徽大学历史系 纪丹阳)

俞兆鹏新著《史林杂俎》评价

陈智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俞兆鹏教授新著《史林杂俎——俞兆鹏史学文选之二》(以下简称《史林杂俎》)一书,近日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兆鹏教授第二本史学文选,收入他近年撰写学术论文39篇。笔者与兆鹏教授相识多年,有幸先睹为快,故略陈数语,对该书稍加介绍,该书有如下几个特点:

点、面结合。《史林杂俎》内容涵盖较为广泛,这与兆鹏教授的治学经历有关。他长期工作在高校教学、科研第一线,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多门课程,这就需要他有一个系统、全面的知识结构。书中所收录的论文,对宋代货币史和两宋历史人物思想的研究,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强,说明这两部分是兆鹏教授用力最多、成果最丰的领域,突出了作者研究的重点。在向纵深拓展的同时,作者也积极开拓新

的研究视野,包括政治史、农民战争史、学术史等多个领域,同样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古、今贯通。从《史林杂俎》一书的目录,读者就会很清楚的看到,该书将研究论文分为唐史研究、北宋史研究、南宋史研究、明清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以及史学理论、史传文学等七个部分。其中,断代史研究是该书的大宗。这些成果是作者长期教学实践的心得。历史研究重视问题意识,兆鹏教授能够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从中国传统典籍浩如烟海的材料中,选取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人物、事件、制度、文化予以关注,既体现作者的勤奋,更凸显作者的睿智。

文、史兼顾。在《史林杂俎》中,除了收入史学论文之外,还收录了兆鹏教授撰写的史传文学作品四篇,如:《铁脊男儿谢枋得》、